

李鸿章思想 体系研究

王承仁 刘铁君 著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及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并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

王承仁 刘铁君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王承仁,刘铁君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1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2542-6

I 李…

II ①王… ②刘…

III 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

IV K827.52 K256.1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京山县印刷厂印刷

(431800 湖北省京山县新市京源大道58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4

字数:275千字 印数:1—2000

ISBN 7-307-02542-6/K·208 定价:16.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这个课题是1983年选定的。当时,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讨论正在热烈展开,对李鸿章的重新评价也已引起史学家们的关注,并开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随着争论的展开,必将有深入研究他的学术成果问世。撰写历史人物的专著,一般多采用传记体形式,为了拓宽研究领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我们另辟蹊径,选择了与历史传记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他的思想体系。这是因为,思想体系研究有它的优点:其一,它不着重从纵向考察历史人物的生活道路,而主要从横向剖析其思想的各个侧面,各个部分,便于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人物进行透视,从而对他进行更为全面的介绍评价;其二,这种研究不侧重于历史的过程和具体情节,而从研究人物的主观世界入手,将主观动机同行为及由此而产生的客观效果结合起来考察,更能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当然,这种研究不能取代对人物传记的研究,但却能与传记互证互补,从而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从选定这个课题至今,14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我们尽可能地广泛收集资料,检阅了有关的各种文集、资料汇编及当时国内外人士的笔记、回忆录及其他出版物,收录其中有关李鸿章思想言行的记载,兼及人们对他的印象和评论。虽囿于条件,难免遗漏,但综观所得,总算为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基础。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十分留意了解有关学术研究动态,对其他学者的有关科研成果,本着既防止先入为主之思想和门户之见,又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态度,努力从中吸取启发性的思想营养,实感受益匪浅。对于同我们的认识相左的观点,则认真思考和分析产生不同见解的原因,或纠正自己认识上的偏差,或作为借鉴以防止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类似的失误。

进入 90 年代以来,我们在整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三易其稿,有些章节甚至经过四五次重大修改,才得以定稿。个中艰辛,不难想象。特别是由于两位作者分处于两个不同的城市,各自都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和其他科研工作任务,很难统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进度,致使这项研究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时至今日才将此刍蕘之作奉献给读者。

对李鸿章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前此尚无人做过的工作。我们在这块处女地上拓荒、耕耘,虽花费了大量心血,付出了成年累月的劳动,而取得的成就仅仅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勾勒出了他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包含于其中的思想观点,和对这些思想观点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评说,以期对它获得实质性、规律性的认识,并对它给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等做一番探讨和评估。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我们愈来愈感到,要完成这项工作,不仅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而且要具有较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及扎实的史学业务功底,能准确地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善于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以获得科学的认识。这是我们力争做到而又难于完全达到的。何况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对一个课题的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众多学者的反复探讨、争鸣,才能越来越接近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本书难免有所疏漏,或在某些地方有流于偏狭或浅表的缺失,而不敢妄言完善和深透。

尽管这本著作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只要它能以一家之言

参与学术争鸣,并能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铺设一个台阶,吸引后来的学者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推进史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全书的导论和结语为共同执笔。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三章为刘铁君撰写;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及李鸿章与郑观应思想比较三章为王承仁撰写。王承仁担任了全书最后的统稿工作。

最后想说明的两点是:第一,虽然我们在写作此书时注意尽量避免重复,然而李鸿章思想的各个方面必然有交叉和重叠,为了保持各章的完整性,必要的重复仍在所难免;第二,本书虽为共同研究,但由于是二人分工分头撰写,致使各人所担负部分在文风和有些文字表述的方式上难以强求一律,望读者们谅解。

作 者

1997年5月于珞珈山



王承仁 1932年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195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留系任教。现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湖北省中国史研究会理事；现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撰写和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八十年史》、《中国近百年史辞典》、《太平天国史研究论文集》、《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等著作，并在各类学报、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方面的论文30余篇。



刘铁君 1935 年出生于湖南汨罗。195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旋即回母校研修中国近代史两年。现为湖北荆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教授、荆州市远距离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荆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副主编、湖北省远距离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广播电视大学革命与建设史教研组中心组长。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学政史教学法》、《地方电大管理》，并在各类学报、杂志发表了有关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电大远距离教育研究等方面的论文 15 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编委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
委员

陶德麟

侯杰昌

牛太臣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昌

田德诚

刘纲纪

李进才

杨弘远

郑传寅

侯杰昌

黄惠贤

路见可

牛太臣

齐民友

刘德厚

李裕宜

张尧庭

卓仁禧

郭吴新

康立山

王仁卉

刘花元

朱英国

杨小岩

张泽乾

查全性

陶德麟

彭斐章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政治思想	21
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22
二、“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28
三、“内须变法”	35
四、“每欲为国家建万年不拔之基”和“事君矢诚”	46
五、“寻研义理为本”和“求实求是”	60
第三章 军事思想	70
一、“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71
二、“保和局,守疆土”和“内靖乱萌,外御强侮”	81
三、“变易兵制,讲求军实”	91
四、“以大治水师为主”	109
五、“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	132
第四章 外交思想	140
一、主权观念与外交思想发展走向	142
二、“外须和戎”	153
三、“惟有谨守约章”	166

四、“以夷制夷”	172
五、老来亲豺虎	179
第五章 经济思想	190
一、求富思想	191
二、对外通商思想	219
三、恢复和维护封建经济秩序	231
四、甲午战争后经济思想的演变	240
第六章 文化教育思想	251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内涵	252
二、洋务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	264
三、恢复和维护旧的文化教育体制	271
四、属性、地位和作用评估	277
五、一个值得研讨的学习西方的模式和理论	285
第七章 李鸿章、郑观应思想比较	292
一、对外态度和主张的差异	292
二、文化、政治思想体系不同	306
三、经济思想体系殊异	314
结 语	329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近代活跃着众多的历史人物，在晚清统治集团中，李鸿章可算是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1847年以进士出身步入官场。50年代，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镇压农民起义。60年代，淮军练成后，就成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主要军事将领之一，又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由江苏巡抚而署两江总督、而湖广总督。1870年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正如他死后清廷为他所撰碑文中说的那样：“阁臣疆臣久作群僚之长，商务政务更兼特设之官，既与便宜行事之专，更权总理外部之重。”^①在这25年里，他统率北洋海陆各军，更是清政府军事和外交方针、政策、策略的主要设计者和推行者，参与谋划和指挥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代表清政府谈判和签订了诸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一系列涉外条约；与此同时，他举办了许多洋务企事业，成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其地位和作用在当时

^① 《御制碑文》，《李文忠公全书》卷首，第9页。

举足轻重。即使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了下来，一度受到冷落，也仍不失政治上的巨大影响，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出使欧美，先赴俄国参加沙皇加冕庆典，并代表清廷与沙皇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随后至德、比、法、英、美等国访问。所到各国，对他均十分看重，希望他归国后能再掌大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津、京后，他临危受命，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与庆亲王奕劻作为清廷全权代表，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而被清廷认为立下了“玄黄再造之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李鸿章苦心积虑地擘画，殚精竭力地支撑，以巩固清廷对内的统治，并为这种统治在列强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能够适应和延续，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因此，他死后清廷给予他以很高的评价，以破格的礼遇为他举行丧葬，赐以“文忠”的谥号。

从上可知，李鸿章同19世纪60年代至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不仅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对这段历史产生过同时期官僚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重要影响。他死后不久，梁启超在所著《李鸿章》一书中这样写道：“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①并鉴于李鸿章的这种重要历史地位，而以《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作该书的副题。梁启超的上述论断和作法虽不尽妥当，然而李鸿章是这一时期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就不仅涉及到对洋务运动、洋务派及其有关历史事件的评估，还牵涉到对晚清政府的内外方针政策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外关系及这一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研究和评价。其重要史学价值自不待言。

^① 梁启超：《李鸿章——中国四十年大事记》，第2页。

二

李鸿章历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生前，欧美及日本的政要、新闻界及与之接触过的其他人士，大多称颂他是当时中国要求改革和进步，最希望同西方列强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开明政治家，对他的赞誉和支持多于批评和反对。然而在国内，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对其从事的洋务活动，特别是对他的军事、外交方针、政策的得失利弊看法歧异，对他的臧否就大相径庭。他死后，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一书，对他一生的主要活动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总结和评论，可谓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李鸿章的著作。虽然，由于作者受自身的世界观、政治观点、史学思想及其他条件的局限，该书的内容难免粗疏和浅表，其中有些观点也未免有些偏颇，但对许多具体问题乃至某些根本问题的见解（如对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总结），确有不少精辟之处，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称道。此后的近半个世纪，对李鸿章深入系统的研究者不多，但对他的评价歧异仍是非常明显。大多数公众舆论和学者，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和民族耻辱的印记，而这些条约的相当一部分的产生，与李鸿章的军事、外交思想和活动有关，并由他经手签订的角度出发，因而，在批判清政府腐朽无能，对外妥协投降时，也就自然地给了李鸿章一个否定评价，甚至是“卖国贼”的骂名；另外有些学者如蒋廷黻等则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明智正确的外交家，对他的洋务活动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也有一些学者对他的军事、外交活动基本否定，而对他的经济、文化教育活动，则给予了一定的认可。

解放后，史学研究如枯木逢春，芳菲竞发，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史学家对李鸿章的评价却几乎是一致持否定态度，但又缺乏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50年代中期出版的《卖国贼李鸿

章》一书，可谓是持否定、批判李鸿章观点的集大成者。60年代初，有的学者提出应对洋务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经济和文化教育活动进行重新评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缺乏平等争鸣的氛围，问题的讨论尚未展开便中断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肆虐，影射史学泛滥，谈不上有多少认真的学术研究，洋务运动和李鸿章之类的事件和人物，都只能当作“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典型批判，而不准有不同意见发表。

浩劫之后，萧瑟了10年的史学研究园地又在春风吹拂下复苏。史学家挣脱了“左”的思想禁锢，重新审视历史，放胆争鸣，畅所欲言，推动着历史研究向新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发展。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对洋务运动及其有关人物的讨论，吸引着众多学者。对作为洋务运动核心人物的李鸿章的评论，自然成为研讨的热点课题，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涉及到他思想和活动的诸多方面。一些学者一反过去的观点，认为李对中国近代的开放和进步起了带头和颇大的推动作用，有的甚至给他戴上了“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对他持肯定或基本肯定观点的人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承认李鸿章和洋务运动在某些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对他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者，仍大有人在。1988年10月，在安徽合肥举行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讨论会》。这是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李鸿章为题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虽然着重讨论的只是他的经济活动，但其影响较大。在这次会议上，已故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发言中，根据到会一些学者认为的“近代中国旨在追求近代化，而洋务运动这一步与李鸿章关系极大”，“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开创人”，明确提出了“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①的看法。他的话音甫落，上海的另一位史学家便撰文表示异议。这位学者不仅不同意陈先生的上述

^① 《文汇报》1988年12月6日，第3版。

论断，而且认为，首先应对中国的近代化作一个界定，究竟是因为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还是必须包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才算近代化？他在文章中还尖锐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学风问题，指出不应因今天正搞现代化和对外开放，就以时好为好，任意摆布历史。^①正是这种不同观点热烈的争论，使一段时间里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研究空前活跃，并推动着这种研究向纵深发展。

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苑书义先生写的《李鸿章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学术力作。作者将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力图实事求是而又较为生动地进行叙述，客观而科学地进行评价。全书内容丰满而不繁琐，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取得了较大成功，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然而，一部史学专著难于尽善尽美，作者的思想观点也不可能为所有的学者所接受。我们认为，这部传记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有些问题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它的问世是对李鸿章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并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对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研究继续保持着发展势头，又有一些学术专著陆续面世；同时，还有不少学者在认真地搜集和整理资料，力图从新的或更全面的角度进行审视，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水平。

三

不同史学思想、史学流派的争鸣是正常的、可喜的现象，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必经的途径。自7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界在对

^① 夏东元：《关于李鸿章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2、3期。

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上，通过讨论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如大家认为，19世纪60年代以来，是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创办近代企事业的时期。这时，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均与李鸿章等所从事的洋务活动有直接关系。大家也认为，中国此时不仅未能与邻国日本一样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道路，而是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家和民族遭受到了更大的苦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显然不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近代企事业有什么过错，然而，它与李鸿章等推行的洋务运动到底有无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大家还认为，李鸿章的思想和活动，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较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实事求是地总结他所从事的洋务活动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深刻阐述其内在原因，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必须，也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以上共识说明，国内史学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具有基本相同的目的和方向，绝大多数史学家也都有求真求实的态度和愿望。然而，分歧也是明显的。一般地说，由于掌握的资料、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等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有歧异，是史学研究中常见的现象。有所不同的是，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仅形成基本否定和肯定两种对立观点，而且直接关联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更涉及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特点、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不同认识，这在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研究中是仅见的。

众所周知，人们都是在十分确定的经济、政治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谈到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绝对要求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谈到某一个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换言之，如果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前提和条件及具体历史特点的认识不同，就必然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用不同的尺度，从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对李鸿章